

戴知贤 著

百花齐放

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陈出新

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戴知贤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戴知贤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00 000

印 张：8

版 次：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500

书 号：ISBN7-300-01535-2/G·191

定 价：4.50 元

4-16/2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目 录

第一章 毕生关注文化事业的伟大政治家.....	1
一、从“文化书社”到湖南农民文化运动.....	1
二、苏区的文化建设.....	4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政策.....	7
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	12
五、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	15
六、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17
第二章 关于“文化”的一个定义	20
一、唯物主义的文化观	20
二、政治的重要地位	24
三、观念形态的伟大作用	28
四、两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33
第三章 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37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37
二、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总结	40
三、承继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44
四、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	50
五、着眼于“今用”和“出新”	57

六、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	61
第四章 毛泽东文艺思想	69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	69
二、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	73
三、文艺与社会生活	78
四、《讲话》的基本精神和时代特点	84
五、歪曲和诋毁	90
第五章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96
一、“双百”方针应运而生	96
二、文化科学欣欣向荣	102
三、深刻的阐述，真诚的支持	108
四、“双百”方针遭受挫折	117
五、曲折历程 30 年	124
第六章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129
一、对“左”倾错误政策的纠正	129
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及党的政策	135
三、“团结、教育、改造”	140
四、两个短暂的“春天”	148
五、世界观和阶级属性	156
六、失误原因初探	162
七、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和精辟论述	169
第七章 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上）	176
一、毛泽东读古书	176
二、古训今用，治国安邦	182

三、以史为鉴·····	187
四、古典哲学的继承和改造·····	194
五、《孙子兵法》和革命军事思想·····	203
 第八章 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下）·····	211
一、热爱古典文学·····	211
二、钟情古典诗词·····	218
三、辞章家、书法家·····	227
四、伦理人情和生活个性·····	235

第一章 毕生关注文化事业的伟大政治家

一、从“文化书社”到湖南农民文化运动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许多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关于共产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等等，此外，还有关于文化方面的思想和政策。

毛泽东这位雄才盖世的伟大政治家，毕生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关注着全国人民思想品德、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于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研究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1919年起，他积极参加组织进步青年到欧洲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激发民众起来同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

同年7月，他发起成立“健学会”，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

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

1920年7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发起成立“文化书社”，把建设中国的以至于世界的新文化看作是“大家公负”的责任。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彻底些说罢，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

这一段话，显示了毛泽东要建设新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和高度热情，表现了他对俄罗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向往。

为了担负起建设新文化的责任，毛泽东等人决定成立一个书社，向湖南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介绍、推广、传播文化的书籍和报刊。他在《缘起》中说明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毛泽东从新文化——新思想——新研究——新材料四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说明他们为什么首先创办文化书社，然后将成立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的缘由。他表达了湖南人、尤其是青年人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迫切需求。他关心的不只是几个人的文化学习，而是要“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为全体湖南人、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最新鲜的精神食粮。

文化书社同上海、北京著名的书局、报馆、杂志社建立业务联系。到9月9日，购得图书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1〕}。图书杂志门类十分广泛，包括哲学、伦理学、社会科学、政治思想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类书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科学的社会主义》、《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治与中国》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读物^{〔2〕}。据“文化书社同人”散发的宣传广告中说，该社所售的书籍，都“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读者在思想上受到好的影响，“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3〕}。

文化书社销售了许多进步书籍，仅仅1920年9月9日至10月20日的1个月零12天的时间里，便售出各类新书383册，各类杂志815份^{〔4〕}。文化书社创办了7年（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了很大贡献。

1921年10月，毛泽东创办了“目的在改造现社会”的湖南自修大学，设科学、哲学、文学三类课程。他规定这所大学“采取古代书院和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采取“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和“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学习方法。校内设有图书馆，收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进步书籍报刊，供学友阅读。教育家蔡元培看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欢喜得了不得”，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他在《新教育》杂志上介绍自修大学，说它“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5〕}。为了便于工农大众和文化水平较低的青年入学，自修大学还附设了一个补习学校。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生长在农村，最了解中国农民没有文化的痛苦。1925年以后，他又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所以，在文化

方面，他最为关心的，是广大农民能享有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1927年3月，当农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蓬勃兴起、同时受到种种责难的时候，毛泽东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状况，他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农民运动，说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做了14件大事，其中第8件是普及政治宣传，第12件是文化运动。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

“中国有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有一句废话。”

这段话充分地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文化的渴求和毛泽东看到农村文化运动迅速兴起的由衷喜悦。同时它说明，要想在农村普及文化教育，必须首先发动农民进行革命，让他们自己起来办教育；如果不进行反封建的革命，农民在政治上没有得到翻身，光凭知识分子和少数“教育家”在那里叫唤，那么，“普及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苏区的文化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重心转移到了农村。毛泽东在领导苏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苏区的文化建设，强调文化教育工作要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1929年12月，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的党内教育和

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教育、文化学习，都作了具体规定。例如在决议的第4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和第5部分“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中，他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官兵中轻视宣传工作和宣传队的错误观点应当纠正。他强调要加强宣传队伍的建设，充实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提出建设一支文化军队的初步设想。决议列举红军宣传的各种方式和方法，例如：出壁报（名为《时事简报》，报导国际国内政治消息），征集并编制表现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出版石印或油印的画报，组织化装宣传队，等等。决议还指出，要“很艺术地”编制士兵教育课本，把苏俄红军、红军与白军的比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革命故事、社会进化故事、卫生常识、苏区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革命歌谣、画报等当做教材。

在决议中，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意思是给士兵上课、教授时，应当注意10个方面的方式方法，即：（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大教授法”是毛泽东本人进行新文化教育的经验总结，是对旧的文化教育方法的否定和批判。它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至今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教学方法。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宣言》和《宪法大纲》；规定了工农民主政府关于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强调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首先必须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文化教育和制度，保证工农及其子女的教育权，对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教育，使他们成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积极参加者。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

告，进一步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他把革命文化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指出文化斗争是“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他指出苏区的文化教育区别于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教育。他说：“国民党统治下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80%以上。”而苏区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权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接着，他还提出了创造工农新文化的任务。他说：“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为了培养和造就大批领导干部，适应革命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苏区创办了包括党、政、军、医、农、教育和文艺等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其中著名的有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和各类教育干部学校和师范学校。

苏区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毛泽东在1930年10月至1933年11月所作的兴国、长冈、才溪3个乡的调查中，都记载了该地文化教育运动开展的情况。他说，在兴国，童子团的团员“都在人民学校读书”，“平民夜学村村都有”；长冈乡有列宁小学4个，每村1个，入学儿童占全乡学龄儿童的65%，全乡16—45岁的青壮年大多数进了夜学，此外还有识字班、俱乐部。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号召：“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相对来说，中共中央有了比较稳定的后方，毛泽东非常关心部队和干部的政治文化学习。例如他在1936年写信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书，大约共买10—15种左右，要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又如，1936年毛泽东写信给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特别强调要对学员进行文化教育。他说“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所谓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局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他建议红军大学二三两科，在以后的4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 $\frac{1}{4}$ 或 $\frac{1}{3}$ 。在进行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信中所说的“三科”，是指红军大学里的第三科。当时红军大学分一、二、三3科，第三科的学员都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

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了他对提高红军（尤其是这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文化水平的高度重视。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他从抗战和解放区的实际

出发，一方面注重干部教育，积极培训大批抗日干部；另一方面广泛发展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文化水平和民族政治觉悟。

当时，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培养干部的学校。1939年1月，毛泽东在对抗大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增强抗战力量的办法很多，然而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这个增加抗日力量的办法是与其他一切增强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抗大的课程由毛泽东亲自确定，一共是四科：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辩证法唯物论。其中辩证法唯物论的课程，就是由毛泽东主讲。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毛泽东在抗大讲演时讲授提纲中的两部分。

在培养抗日干部的同时，毛泽东十分关心农民和工农干部的基础文化的学习。他说：

“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6〕}

1945年10月，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专门为工农干部编写了《文化课本》。毛泽东为该课本写了序言，阐明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和出版文化课本的意义。他写道：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

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聪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迫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⁷⁾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国历史遗产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总结历史遗产的任务。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干部和党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懂得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所以他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1940年1月，《中国文化》杂志在延安创刊，毛泽东在该刊上发刊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他系统地论述了我国近代文化革命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特点，提出了“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任务，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毛泽东还在其他许多文件、文章中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1940年12月25日，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指示《论政策》中说，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一起合作，办学、办报、

做事”。他主张“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他向新的“联合政府”提出31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并对这些要求作了说明。关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从80%的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抗战时期，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十分重视文艺工作。他和文学艺术的作家交谈，阅读和评论他们的作品，给他们写信，称赞他们，鼓励他们进步和努力用文艺的武器为人民、为抗战服务。

早在1936年11月，在陕北苏区首府保安，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他要求文协的同志“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9年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萧三，说读了他的诗稿，“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他创作得更多些。

1942年6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罗烽说：“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

1944年1月9日，在看了延安中央党校演出的新编京剧（当时称为平剧）《逼上梁山》之后，毛泽东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